

『中国语言文学作品与史料选』系列教材

西方文论 作品与史料选

徐亮 苏宏斌 主编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语言文学作品与史料选』系列教材

西方文论 作品与史料选

徐亮 苏宏斌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论作品与史料选 / 徐亮, 苏宏斌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308-13610-5

I. ①西… II. ①徐…②苏… III. ①文学理论—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0917 号

西方文论作品与史料选

徐 亮 苏宏斌 主 编

责任编辑 宋旭华

文字编辑 唐妙琴

责任校对 杨利军 周晓竹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8.5

字 数 712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610-5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总 序

吴秀明

假如将迄今为止种类繁多的中国语言文学“选本”进行分类,我以为大体可分为非专业与专业两种类型。前者,主要针对非中文专业的学生而言,也包括社会上的一般语言文学爱好者,它侧重于作品的诗学价值;后者,则主要针对中文专业的学生而言,它除了诗学价值外,还要兼及史学价值。本丛书属于后者,它带有专业化、专门化的性质和特点,其初衷是为他们提供诗、史兼备,并与现行的“通史”(语言史、文学史)教材相配套的一套“选本”,以满足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和创新型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这也是中文核心主干课程的主要教材。按时下的类型划分,不妨称之为研究型教材。

众所周知,现有的中文专业学生使用的“选本”尽管在选择的标准、内容、形态、方式等方面各具特色,存在着不少差异,但在基本范式和总体思路彼此却表现了某种惊人的同构性:那就是选文的对象和范围都锁定在文学作品上,它向我们呈现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当然也是美轮美奂的经典之作。所谓的“选本”,其实就是“文学作品选”,它也只向“文学作品”开放,其所内含的“诗学”指向是非常明确的。文学作品作为特定历史阶段文学创作的表征和载体,它凝聚了时代思想艺术的精华,对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尤其是近些年因诸多原因导致的审美贫乏症,在往往只记住概念、名词而对作品整体美、内在美不知何物的情况下,更是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也因这个缘故,我对近些年来各高校一改旧观而普遍重视经典作品的教学理念表示理解和赞赏,并认为将来还有继续强化之必要。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仅仅是中文教育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它也不能包办和取代其他。实践表明,作为一个传统基础系科,中文教育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各个专业彼此间的办学目标、层次、规格也不尽相同。特别是一些学术积累比较深厚、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办学水平比较高的系科,更是已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探索,这也是当下中国乃至海外中文教育的客观历史和现实。而对研究型教学来说,到底如何在读好、读懂、读深经典作品的同时增加学生的根源性学养,培育他们良好的研究习惯与学风,为将来继续进行专业深造和可持续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一句话,到底如何拓宽学生的思维视野和知识结构,培养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这是当前中文教育亟须解决的一个问

题,也是研究型教材的主旨所在。

浙大中文系推出的这套涵盖文艺学、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5个二级学科、总计12卷的《中国语言文学核心课程作品与史料选》,就试图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我们编选的这套“选本”,看似好像只是在“作品”之外增加了一些“史料”,但它却反映和体现了我们对教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理念上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这套“选本”强调客观呈现,注重历史还原

这里所说的呈现和还原,当然包括“选本”所选的文学作品在这方面的功能价值——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诚如经典作家所说的那样,它的“书记官”的功能价值,使它在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毕肖酷似上往往达到连史家都叹服不已的程度;但主要还是指被我们特别引进的这些文献史料:如序跋、诗话、传记、碑文、笔记、书信等,现代以降的如社团、传媒、文件、讲话、批示、社论、纪要、评论等。这些形态各异史料的编选,不仅有效地拓宽了原有“选本”的内涵和外延,使之在整体构成上产生了革命性的扩容,而且还以其物化的形式引领我们穿越时空隧道,返回到彼时彼地的那个时代的语境与场域,与“作品”形成了富有趣味的对话关系。史料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载体,它原本就是属于历史的,在它身上积淀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而文献史料作为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一种史料是实物史料),它凭借语言文字同时兼具能指与所指的双重功能,在还原和营造历史尤其是历史现场感方面还有自己独到的优势。因此它特别适用于文学作品的历史解读,历来备受重视,成为自古至今人们解读文学作品的重要参考和佐证。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品与史料是一对孪生体,它们彼此具有难以切割的血缘联系。如果说作品是悬浮在空中的一种空灵的感性存在,那么史料就是紧紧扎根在大地之上的一种具体切实的物态存在。也正因此,史料的有无、多少以及真实与否,史料意识的自觉与否以及实践运用的程度如何,不仅直接关涉和影响着具体作品的解读,而且也反映乃至决定着整体中文教育的水平和质量。中文教育的睿智与睿智的中文教育,都十分注意作品与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不是将它们彼此隔离割裂。王国维所谓的治学“三互证法”,即“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取地下之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①可以说是对此的精辟概括。他的《宋元戏曲考》以及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俞平伯的《红楼梦

^①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页。

研究》、阿英的《晚清小说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姜亮夫的《楚辞通故》、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等作，都可以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典范。在他们那里，史料经过发掘、勘误、订正、转化、处理，不仅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成为还原历史、破译作品奥秘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许多长期以来的语言文学之“司芬克斯之谜”，也因之得到了合理解释。

北大中文系教授温儒敏有感于“专业阅读”存在的经典作品与当代读者之间的“历史隔膜”，在十年前曾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主张，叫“三步阅读法”，其中第二步为“设身处地”，就是借助和调动文学史及文化史知识，再融会自己的想象，努力“回到作品产生和传播的历史现场”。^①我们之所以在“选本”中增加了史料，其实也就是借助于史料“设身处地”地“回到作品产生和传播的历史现场”。在这里，史料一方面可以很好地起到营造历史氛围的作用，这对因“历史隔膜”造成的各种主观随意或过度阐释无形之中形成一种防范和反弹；另一方面它也引导我们情不自禁地进入到特定的历史规定情境之中，以“了解之同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②从而对作品作出更加精准到位、也更合乎情理的解读。当然，重视史料之于还原历史以及参证和解读作品的功能，绝非意味它可以取代对作品的艺术分析，用所谓的“史学价值”来代替“诗学价值”，那同样是不可取的。在“作品与史料”或者说在“文学与史料”的关系问题上，我还是比较赞赏一位年轻学者的这样一种说法：“勇敢地跨出樊篱，而更丰富地回返自身。”^③这可能更合适、更接近温儒敏所说的“专业阅读”，也更符合中国语言文学的属性和趣味。

二、这套“选本”倡导研究意识，培养学术兴趣

这也是研究型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主要体现在选文以及选文的注解上，也体现在对史料的选择上。在这些地方，本“选本”努力倡导研究意识，体现研究理念：一方面用研究的眼光进行选与注，在选什么、怎样选问题上体现史家的眼光，学者的思维和素养，使之超越庸常而具有一定的学术含量；另一方面调动和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从选文、注解特别是从史料那里切入探寻问题，进行必要当然也是初步的学术训练。这里所谓的研究，就史料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向度：（一）立足史料，以史料为基点向社会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政治学、心理学辐射出去广泛地涉及彼时彼地的“社会关系总和”，从那里寻找质疑和问

① 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9页。

②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9页。

③ 金理、杨庆祥、黄平：《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者三人谈》，《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

题的点,在“跨界”的反观中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新的认知,当然也包括新发现或新引进的地下新史料、域外新史料;以此为基点研求问题,不仅可以开拓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且还能进而演化为一个“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语)。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四大文献史料甲骨文、敦煌遗书、居延竹简、大内档案发现对中国文学研究产生的重大影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二)通过史料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彼此之间潜在的矛盾、抵牾和裂缝,从中思考、质疑和发现新的问题,形成问题意识。如南朝梁顾野王所撰《玉篇》中的“今上以为”一词条,以往的一些语言研究者往往将“今上”解读为当时的“梁武帝”,认为这是顾野王在引用梁武帝的看法,藉以说明当时对异体字的重视。而最近有学者在对《玉篇》残卷全面校勘和语词及书写分析的基础上,对此作出了全然不同的正确解读——原来此处的“今上以为”实际是“今亦以为”的讹误,^①于是最终证否了抄本里唯一的“今上以为”与“梁武帝的看法”有关的猜想。大量事实表明,中国语言文学中的很多问题往往都源于史料,正是对这些本源性的史料的精心收集、整理和研究,特别是对这些史料与作品裂缝的敏锐发现、质疑和把握,人们才从习见的话题中翻出新意。这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浙大中文系不少优秀学生学位论文或学年论文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吧。像2005届一位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论明初诗僧姚广孝及其诗文》,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在编写《姚广孝年谱》的基础上将其置于元末明初风云变幻的语境下进行考察,令人信服地作出了自己的结论。该文后以《诗僧姚广孝简论》为题刊发于《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这就从一个侧面证实研究意识培养的重要和必要。

当然,文学研究是很复杂的,它的如何进入和展开因人因对象而异,有不同的范式和路径,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一个“选本”,它对学生研究意识的培养主要是引导,而不是刚性的指令,且在本科阶段不可操之过急,对学生提出不切实际的太高要求。但无论如何,强调研究意识的培养,强调对本源性史料尊重的实事求是学风,强调必要的学术训练,对学生来讲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须臾不可或缺。可能是受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影响,也与现行的体制有关,中文教育长期以来重“思想阐释”而轻“史料考据”。尤其是“三古”(即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以外一些新兴或比较新兴学科以及相关课程,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更突出,也更严重。这就使中文教育尤其是某些作品的解读无形之中被空壳化了,它似乎变成了某种“思想”的简单符号或工具而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这种“思想”在以前是政治学、社会学的,它也被强行纳入政治学、社会学视域中进

^① 参见姚永铭:《可疑的“今上”——〈原本玉篇残卷〉校读割记一则》,《汉语与汉语教学研究》第2期,日本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东京东方书店2011年7月。

行解读;现在则被纳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视域中进行解读,从观念、思维到概念、术语完全是西式的。一切都效法西方,以是否符合刚引进的西方某某主义为取舍标准,而很少顾及作品的“历史语境”和自身的实际情况,更没有很好地考虑与中国固有、迄今仍然富有价值的传统思维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对接。这样的解读貌似时尚,实则用虚蹈空洞的所谓“思想”(准确地说是“西方思想”)代替具体而微的艺术分析。这样一种不及物的研究,它往往不可避免地对作品进行粗暴图解和肢解,显然是不可能真正发现美、洞察美的。为什么现在不少中文系学生对经典作品反应比较冷漠,感受不到其中妙处,先入为主地用某种所谓的“思想”去套作品,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需要指出,在时代整体学术风气的影响下,中文教育重“思想阐释”而轻“史料考据”的现象在最近一些年程度不同地有所改正。在文艺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那里,开始出现了由单一的“思想阐释”向“思想阐释”与“史料考据”的双向互融的方向发展。这是很可喜的,它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出现了重大的“战略转移”。但这仅仅是开始,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西学在中国的强势存在,也由于学术浮躁风的盛行,上述现象还没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据说前几年有人在做“重返80年代”研究时去采访韩少功,曾把新时期的一次重要的文学自觉运动“寻根文学”,说成是因为政治“压力之后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弄得韩少功很郁闷很生气。^① 这里之所出现这样的误读,主要原因在于它不是从“事实”(“史料”)而是从“思想”出发进行。陈寅恪先生在1936年曾批评“今日中国,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学,识见很好而论断错误,即因所根据之材料不足”。^② 陈氏所说的“学”指史料,“术”指方法。旧人只有材料而没有好的方法,失之僵滞,固然难有所为,但新人不依据材料简单套用外国理论进行研究也同样不可取。陈氏的批评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这套“选本”突出教学性质,明确教材定位

这一点在开头就已作了明确定位,并且在前面也多少有所涉及。落实到编选上,就是突出和强调中国语言文学历时演变的规律和特点,通过其发展流程的客观呈现,与“通史”教材的配套对接,形成彼此互动互补的关系。这不仅在作品选择上打破原有单一的“语言文学经典”取舍标准,而是采用“语言文学经典”与“语言文学史经典”双线兼容的编选原则。这样,一些当年曾产生重要影响而思想艺术诸方面存在明显欠缺或不足的作品就被我们纳入了视野。如刘心武的《班主任》,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在艺术上当然不免粗糙,还明显打上那个时代

^① 参见:《文学批评的语境与伦理——第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

^②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7页。

的烙印;但从当代中国语言文学史的角度看,却是无法完全绕开的一个代表作。史料也同样如此,为体现历时演变的规律和特点,既注重与文学史的发展流程吻合,特别选取对于文学史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经典史料”,也关注具有原创价值的新出土和域外新传入的“新史料”。如“古代文学卷”中的唐代文学骈文部分,就恰当地利用了大诗人王之涣墓志、韦应物墓志,与边塞诗人岑参密切相关的新疆吐鲁番出土的“马料账”,还有日本正仓院的《王勃诗序》中所收的《滕王阁序》等。这与以前同类教材中的“作品汇评”和“资料长编”式完全不同。现有的中文“选本”往往大同小异而内涵又比较紧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教学,也不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结构。我们这样做,其意是想选择这样一种“文史互证”、“双线兼容”的新的范式,更好地反映中国语言文学丰富复杂的存在和发展,与“通史”教材对接;同时也为教师和学生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掘,留下足够的空间。

总之,在选什么、怎样选问题上,包括内容、体例、篇幅,也包括作品与史料以及彼此内在关系和逻辑关联等,都与“通史”教育乃至整个中文教育大系统联系起来予以通盘考虑,服从并服务于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按照教材编写规律和原则办事。也就是说,一方面要考虑“选本”自身的独立性、新颖性和完整性,努力构建适合专业教育需要的一种新的范式;另一方面又要考虑与“通史”教育相连接,成为“通史”很好的配套教材。也只有与“通史”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虑,“选本”所选的有关“作品与史料”才能被有效地激活,充分凸显其意义和价值。从中文教育和教材编写的角度看,“选本”与“通史”应该是相辅相成,它们分则各自成章,合则融合无间,是一个既独立又统一的有机的整体。

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具体到各学科、各分卷情况也不完全相同。如语言文字学与文艺学,作品与史料往往就连结在一起,很难区分和切割。就说文学吧,彼此的差异也颇大。如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其作品与史料具有较强的经典性、恒定性;它们所选的作品,往往既是“文学经典”又是“文学史经典”,是二个“经典”的合一。而在现当代文学那里,作品与史料则表现出明显的非经典性(或泛经典性)、不稳定性,其所谓的“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经常是分离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只能称之为“文学史经典”而很难说是“文学经典”。这里有学科方面的原因,也与它们彼此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语境有关。这无疑给我们编选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中国语言文学原本就是一个无限丰富复杂的浩瀚世界,为了尊重并还原呈现这种原生态,以满足研究型教学和人才培养之需,我们采取求同存异的原则,即在保持全书基本统一的前提下,尽量尊重各学科的特点和各分卷主编的个性。

这套“选本”凝聚了浙大中文系诸多同仁的心血,也融入了他们对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诸多思考。从2010年下半年酝酿、提出并分头编选,最后复又讨

论、定稿,在此期间我们各司其职而又通力合作。借此机会谨向同仁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正是大家敬业、支持和努力,才使这一编写计划得以圆满完成。同时,我还要感谢浙大出版社副总编樊晓燕女士、黄宝忠先生以及责编宋旭华先生,他(她)们自始至终、倾心尽智的参与、谋划和把关,也对本丛书的编选及其按时保质出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

浙大中文系从1920年之江大学国文系“源头”算起,迄今已有近百年历史。与海内外诸多兄弟院系一样,浙大中文系目前既面临良好的发展际遇,又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拐点”上,如何在继承传统、教书育人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培养具有较深厚基础和较强创造精神的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人才,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也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我们这次推出的这套由集体合作编写的“选本”,就是冀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研究型教学和教材编写是近些年议论较多的话题,也是不少同行感兴趣而又众说纷纭的一个话题。作为一个传统老系,我们愿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也很希望听到来自各方面的声音,以期将来重版时把它修订得更好一些。

2012年2月5日于浙大中文系

编选说明

已经有很多西方文论方面的原典选编问世,我们编选这部《西方文论作品与史料选》试图提供一些新的元素。首先,最主要的是为每一篇正选原典作品给出能够说明其背景和意义的史料,这避免了原典的抽象性。文学理论大家,其文论思想是有所为的,其中有些同时是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理解他们的文学理论必须给出他们面临的紧迫问题、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 and 方案以及文学理论在他们思想框架中的位置和作用。单个的原典篇目要求给它以解释性的语境,才能成为生动的理论展示。史料部分就是意在提供这一更大的背景和语境。其次,因为是史料,这种背景介绍就不是由我们来说,而是由经过精选且具权威性的其他历史文本来说话,其中许多文本本身就具有经典性。最后,我们特别重视现当代的西方文论,在篇幅安排上给予了偏重。读者和学生有权在知识论层面上吸纳最新的养料。现当代文论有助于人们了解文学理论的当下处境,推动理论创新;同时,鉴于西方理论对传统的依赖,现当代西方文论中的经典作品最生动地展示了理论古老源头的活力,有助于我们对古代和近代文学理论的理解。

西方文论作品,是指欧美历史上经典的理论作品。对这些作品的挑选,我们的根据,除了它们在理论史上明显的影响力外,还有它们所起的积极作用。对于那些曾经因影响大而经常被选入,但实际上作用平庸、阻碍创造性的理论,我们认为其已经失去了经典性,因而不纳入。史料,如上所述,是对文学理论原典的背景、释义、来龙去脉、运作示范等的展示有所帮助的文本材料。这方面的选材除了兼顾权威性、经典性(其中许多篇目本身就是文学理论史上的经典作品)外,还特别照顾了学理层面(有助于从学理上把握所选篇目的价值),突出史的观念(显示所选篇目之间的联系和发展脉络)。我们对本书正选和史料选部分的译本进行了比对和精选,参考了近年西方文论翻译的新成果,尽可能选用学界公认的优秀译本。

在编辑上,为了突出针对性,我们在每一篇正选原典作品后面直接编入相应的史料选。我们把西方文论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部分。古代部分主要是西方思想开端时期的古希腊、罗马文论;近代部分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主要是认识论视野下的文学理论;现代部分涵盖了20世纪初至今影响重大的几种文论,如语言论路径的主要理论、现象学存在论、心理分析理论。由于篇

幅限制,难免挂一漏万,但所选篇目都尽可能保持原样,较少在篇章中做删节,尤其是正选篇目。选目主要按时间顺序编排,兼顾理论流派的集团性。

本书由徐亮和苏宏斌两位教授共同拟定选目,其中巴尔扎克、海德格尔、艾略特、德里达、詹姆逊部分由苏宏斌编选,其余由徐亮编选。现代部分所选雅各布逊《语言学与诗学》一文,国内现有译本见于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波利亚科夫编的《结构—符号学文艺学》。该译本主体部分翻译质量颇高,不足之处是删去了一些章节,有些还是该文中至关重要且被引用极多的段落。现由徐亮根据该文最初问世的英语版本译出全部被删节的5段内容计2400字,并插入原有位置。本书附有所选篇目来源,对源文本中明显的错讹做了纠正。我们的博士研究生文玲、张琦璋、岑星参与了查找和复印资料的工作。本选本切望得到读者、方家的批评与指正。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文学专业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相关课程时用,同时也可作为文学及其理论爱好者的基础读物。本书既可作为文学理论、西方文论的教材,因为它按照时代顺序编选,并对每一重要篇目的文化思想背景及其在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等给出了说明;也可以作为那些有自身叙述体系的相关课程的资料性读本。

编 者
2013年夏

西方文论部分各篇出处

一、古代部分

柏拉图

文论作品

伊安篇(《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理想国(节选;《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史料选

柏拉图和哲学(让·布兰,《柏拉图及其学园》,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亚里士多德

文论作品

诗学(节选;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史料选

亚里士多德(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二、近代部分

雪莱

文论作品

诗之辩护(缪灵珠译,《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史料选

诗的四个时代(皮科克著;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抒情歌谣集》1800 年版序言(华兹华斯著,曹葆华译,节选自《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

黑格尔

文论作品

美学(节选;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史料选

艺术最好的题材——人的形象中的神性(选自吉尔伯特·库恩著;《美学史》第十四章,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

黑格尔(克罗齐著;见《美学的历史》第九章,朱光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马克思

文论作品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史料选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第一章前三节,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巴尔扎克

文论作品

《人间喜剧》前言(丁世中译,见《巴尔扎克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史料选

巴尔扎克和现实(节选;米歇尔·比托尔著,见《法国作家论文学》,王忠琪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尼采

文论作品

《悲剧的诞生》前言(周国平译,见《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史料选

自我批判的尝试(尼采著;见《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尼采美学(选自吉尔伯特·库恩,《美学史》第十七章,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标题为选者所加)

三、现代部分

弗洛伊德

文论作品

创作家与白日梦(林骧华译,见《现代西方文论选》,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

史料选

《俄狄浦斯王》与《哈姆雷特》的分析(弗洛伊德著;见《释梦》第五章第四节,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标题为选者所加)

对精神分析之象征的解释蔚然成风(吉尔伯特、库恩著;见《美学史》第十九章,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海德格尔

文论作品

艺术作品的本源(见《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史料选

什么是文学?(节选;萨特著,见《萨特文学论文集》,施康强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T. S. 艾略特

文论作品

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译,见《“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史料选

意图谬见(维姆萨特、比尔兹利著,罗少丹译,见《“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感受谬见(维姆萨特、比尔兹利著,黄宏熙译,见《“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什克洛夫斯基

文论作品

作为手法的艺术(见《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史料选

艺术的概念(节选;别林斯基著,满涛译,见《文学的幻想》,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标准语言与诗的语言(穆卡洛夫斯基著,邓鹏译,见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雅各布逊

文论作品

隐喻和换喻的两极(张祖建译,见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语言学与诗学(见《结构—符号学文艺学》,(俄)波利亚科夫编,佟景韩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该版本漏译部分约2400字由本书主编徐亮根据英语

版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Style in Language* ed. Thomas Sebeok, Cambridge: M. I. T. Press, 1960 年版译出并补入原位)

史料选

普通语言学教程(节选;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明凯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言语的力量:科学与诗歌(保罗·利科尔著,朱国均译,见《哲学译丛》1986 年第六期)

罗兰·巴尔特

文论作品

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裕禾译,见《外国文学报道》1984 年第四期)

今日神话(节选;见《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

从作品到文本(杨扬译,见《文艺理论研究》1988 年第 5 期)

史料选

表征的运作(节选;斯图尔特·霍尔著,见《表征》,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德里达

文论作品

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张宁译,见《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史料选

解构派:雅克·德里达(拉曼·塞尔登、彼得·威森德、彼得·布鲁克著,见《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尧斯

文论作品

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王卫新译,见《外国文学报道》1987 年第一期)

史料选

尧斯与接受美学(弗拉德·戈德齐希著;见尧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版,标题为选者所加)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文论作品

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节选;王逢振译,见《最新西方文论选》,王逢振、盛宁、李自修编,漓江出版社 1991 年版)

史料选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戴维·R. 迪肯斯著,周晓亮、杨深、程志民译,见《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